

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

龚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710)

关键词: 隋唐; 长安城; 外郭城; 宫城; 城门

摘要: 本文基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 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讨论了隋唐长安城在城门设置和形制方面, 对《周礼·考工记》都城模式、汉魏南北朝都城城门传统的继承及五门道的创新之举, 同时, 对城门使用过程中的增缩改建、都城门阙及宫城门阙的有无及设置等关键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Keywords: Sui-Tang Dynasties; Chang'an; Outer City; Imperial City; City Gate

Abstract: Basing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combining with historic literary record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rites the city gates of the capital of Sui-Tang dynasties, Chang'an, whose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siting, shape and structure, inheriting city layout mentioned in Rites of Zhou: Record of Trades and conventions of city gate construction prevailing during Han, Wei,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 innovation, building five doorways in a city gate, was also applied when the city gates of Chang'an were built.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probes into key issue such as the expansion, reduction, remolding of the city gates during utilization, and the exist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side towers at the city gates and palace gate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6.003

隋大兴唐长安城(下文为方便起见, 将略称“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都城, 其城门建筑是我们理解和复原当时都城规制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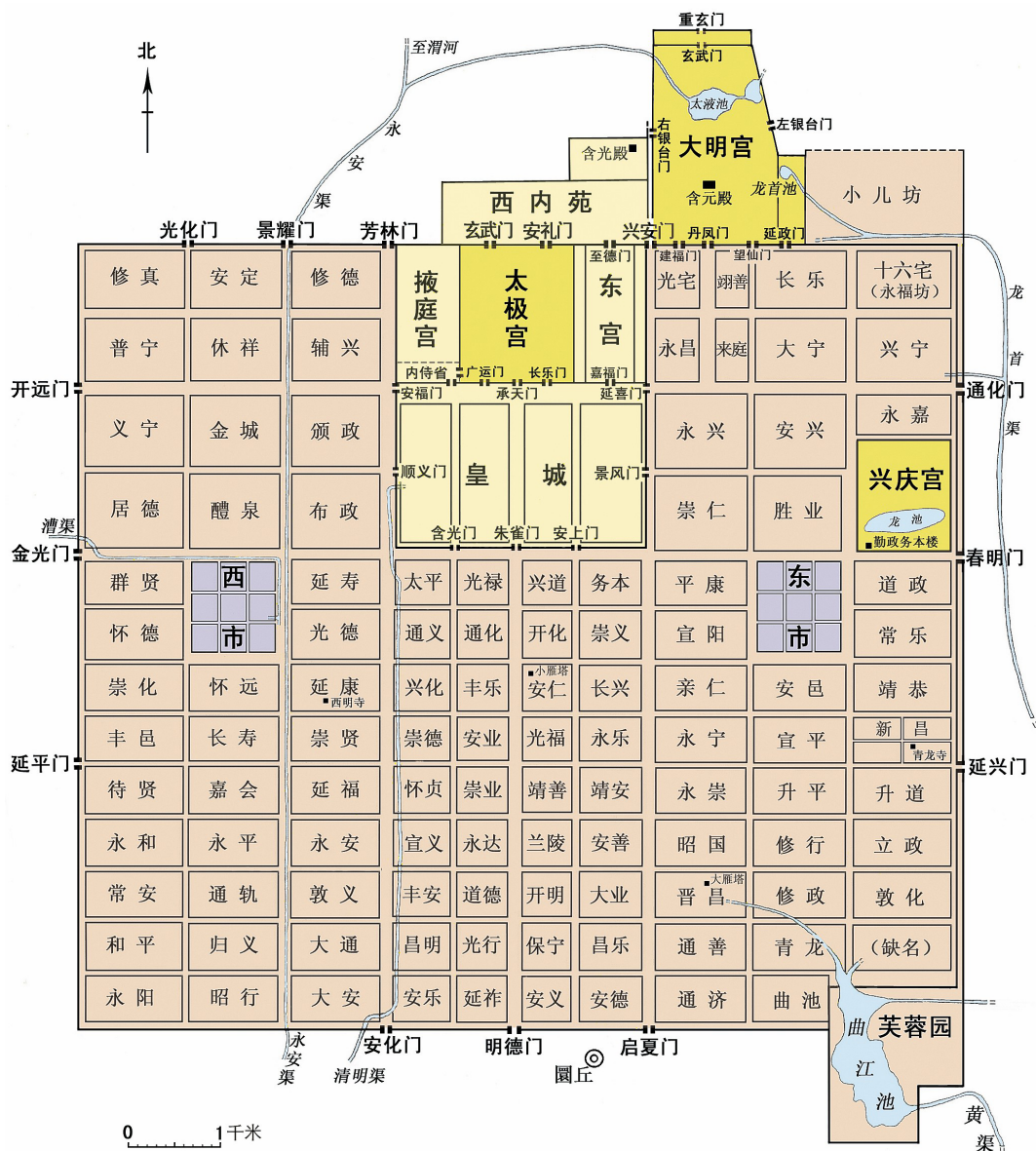
目前隋唐长安城遗址主要覆压于现代西安城市之下, 考古工作只能在城市建设的空隙和夹缝中加以开展, 局限性很大。目前, 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城门主要有外郭城的明德门、延平门、延兴门、春明门、皇城的含光门、太极宫的承天门以及大明宫的丹凤门、玄武门等遗址^[1], (图一)涵盖了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城门, 其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都城城门建筑的不同内涵特点。

因篇幅的局限, 本文讨论的内容仅涉及隋唐长安城城门形制的继承和创新、城门的改建以及双阙的设置问题, 不确之处, 诚请高明者垂教。

一、隋大兴城周设三门及城门三道的问题

众所周知, 唐长安城是沿用隋大兴城并改扩建而成的, 其城墙、城门、街道、里坊、市场等多沿袭隋制, 所以我们研究隋唐长安城城门, 必先搞清其最初的设计思想。

隋大兴城的新建, 至少从城门布局规划方面来说, 是完全遵照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设计理念并结合参照前代的都城城门制度。《周礼·考工记》曰: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唐《贾公彦疏》则进行了具体解释: “王城面有三门, 门有三涂, 男子由右, 女子由左, 车从中央”。可见周礼中的理想国都外形为方形, 城墙四周各面各辟三门, 各门有三道, 也即城内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有九条, 东西南北各三条。而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 中



图一 隋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经北魏洛阳城，晚至北齐邺城的历代都城城门，规制基本与《周礼·考工记》的模式一致，即四周各面均设三城门，各门有三门道。这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充分证实了的。

隋大兴城外郭城的兴建时间在开皇三年（583年），略晚于开皇二年大兴宫和皇城的建设时间（《长安志图》卷上“先筑宫

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关于大兴城的城门，《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三年置雍州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面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延平、金光、开远三门，北面光化一门。里一百六，市二。”据此，大兴城北面似仅有光化门一处。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外郭

城北面应该也有三个城门，即从西至东分别为：光化门、华林门、兴安门。后两个城门的根据分别是：《长安志》卷七、《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均曰：唐华林门隋曰华林门，北入苑；《唐六典》卷七：“大明宫……次曰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门，旧京城入苑之北门，开皇三年开）。”

大兴城的十二个城门，根据考古调查结果，除了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为五门道外，其余均为三门道制，主要继承了汉魏南北朝时期各都城的城门形制传统。

二、隋唐长安城及唐大明宫五门道城门的问题

隋唐长安城各城门之中，经过考古确证的唯有外郭城的正南门、大明宫的正南门是五门道制的城门，它们可谓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五门道城门，是对隋唐以前城门传统制度的重大革新，对宋乃至明清时期宫城城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德门在隋代曾称太阳门（《隋书·礼仪志》记载：“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后改称明德门，唐沿称之，并在永徽五年加筑了门楼。1972~1973年，明德门遗址被考古发掘出来，表明平面呈长方形，墩台东西长55.5米，南北宽17.5米，五个门道基本相同，宽5米、进深18.5米，门道之间夯土隔墙各厚近3米，门道两侧排列有方形的排叉柱坑，可见为木构“过梁式”城门建筑。

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在2005年得到了全面的考古发掘，表明丹凤门墩台东西长74.5米，设5个门道，门道均宽8.5米，进深33米。内侧东、西两马道长54米、宽3.5米（加包砖在内宽达4米）。丹凤门五个门道的确证，证实了宋代吕大防石刻大明宫图及唐代李华《含

元殿赋》对于丹凤门形制的描绘（“十扇开闭”“凤门五开”），纠正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初步考古勘探基础上提出的三门道的错误推论，还原了大明宫的中轴线。同时，根据在丹凤门东西两侧不远的望仙门、建福门遗址的考古调查以及在建福门外发现的百官待漏院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证唐朝时文武大臣上朝不通过丹凤门，故丹凤门只是专供皇帝使用的政治礼仪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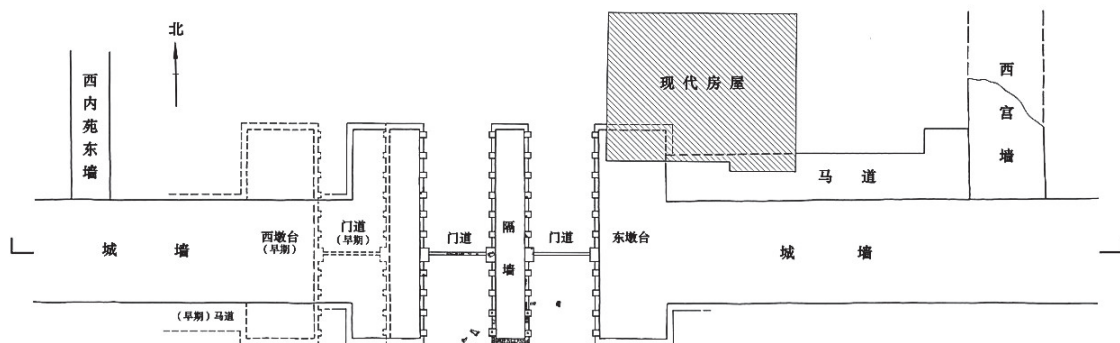
明德门是外郭城的正南门，是长安城南北中轴（宽达150米）朱雀大街的入口之门，向北直达皇城和宫城之正南门，又是隋唐历代皇帝每逢登基、冬至、正月上辛与孟夏之时，出城赴南郊祭天的必经之门，可谓是隋唐国门之所在。而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南门，是唐朝高宗以后历代新皇帝登基、改元、宣赦和举行大型庆祝仪式的场所。由此可见，明德、丹凤两门的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外郭城城门、其他宫门所不及的，其配置的前所未有的五门道，足可体现出都城及宫城的最高等级，彰显南北朝长期分裂以来隋唐大统一国家的宏大气派。

受唐代一门五道最直接的影响是宋代宫城南门的宣德门。据宋陆游《家世旧闻》记载：权臣蔡京认为宣德门制度极卑陋，虽经宋祖宗时增扩，但亦不过三门道而已。蔡京认为古制天子应是五门，所以下令按照天子五门来大兴扩建，并以唐大明宫丹凤门五门道作为扩建的凭据。

三、唐长安城城门的增缩改建问题

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隋唐长安城的有些城门曾经历了缩小、改筑和增建的变化过程。

兴安门位于隋唐长安城北城墙的东段。2009年夏，该门址得以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门址可分为早晚两期，（图二）早期规



图二 兴安门遗址早晚期遗迹平面图

模较大，门向朝北，为一门三道，门道东西宽5.4~5.9米，马道位于城墙南侧西部。晚期规模较小，门向朝南，为一门二道，马道位于城墙北侧东部。这种早晚期的变化现象与兴安门的历史变迁是相符合的。兴安门始建于隋代开皇三年（见上文《唐六典》卷七兴安门条引文），为隋大兴城和唐初长安城北墙上出入禁苑的城门，是外郭城十二城门之一。唐朝建立后，太宗始建大明宫，至高宗时更扩建，使之成为唐朝的正宫，而兴安门则随之缩减，废除了原西墩台，堵塞了最西的一个门道，改筑并降级成一处二个门道的宫门或便门（宋吕大坊的大明宫石刻图上显示兴安门为单门道，此处应以考古发掘结果为准），并称为大明宫南面“五门”之一，主要用于出入翰林院和大明宫后宫。

唐长安城东墙上的延兴门、春明门和通化门在唐玄宗时代也进行了改动和增筑。据《旧唐书》卷107、《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及早年考古勘探资料，有关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早在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城东北隅的十王宅外就筑有复道夹城。开元二年（714年），建立兴庆宫，玄宗敕命在原复道夹城基础上，兴筑大明宫至兴庆宫的北段夹城，以便于在东内和南内两宫之间自由潜行往来。至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又敕命兴筑兴庆宫至芙蓉园的南段夹城，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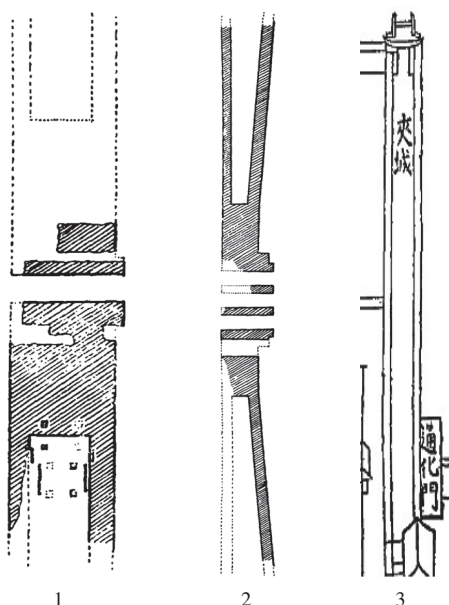
于潜赴芙蓉园和曲江风景区^[2]。至此，唐长安城东郭夹城连通。

东郭夹城兴建的同时，东郭墙上的三个城门也得到了扩建和改造。1955~1957年间考古工作者对东郭墙及夹城进行了勘查，基本了解了春明门、延兴门遗址三门道（开元二十年后改用单门道）、墩台加厚、南北两侧有夹道的特征，（图三，1、2）通化门虽然限于条件当时未作清理发掘，但可据春明门、延兴门遗址进行复原。

春明门遗址经过部分清理，可知东西23.6米、南北宽15米，面积为354平方米。该城门在开元十四年（726年）、开元二十年（732年）时，因兴庆宫的两次扩建和南宫墙的南移，致使春明门内大街缩窄，春明门的北边两个门洞北堵塞不用，仅南边门道仍被使用。而在春明门墩台南侧发现的柱石、柱石窝及两边的铺砖遗迹等，可断定为夹城复道从上面翻越春明门城门楼时的辅助建筑物。

另外，宋代吕大防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并勒刻于石板之上，（图三，3）使得我们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东郭城上的三个城门的大致情形。

由上可见，唐长安城墙的城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据政治的需要和使用的方便程度而灵活地增缩变动的。



图三 唐长安城东郭墙三门形制示意图
1. 春明门址平面 2. 延兴门址平面
3. (宋)吕大防石刻图的通化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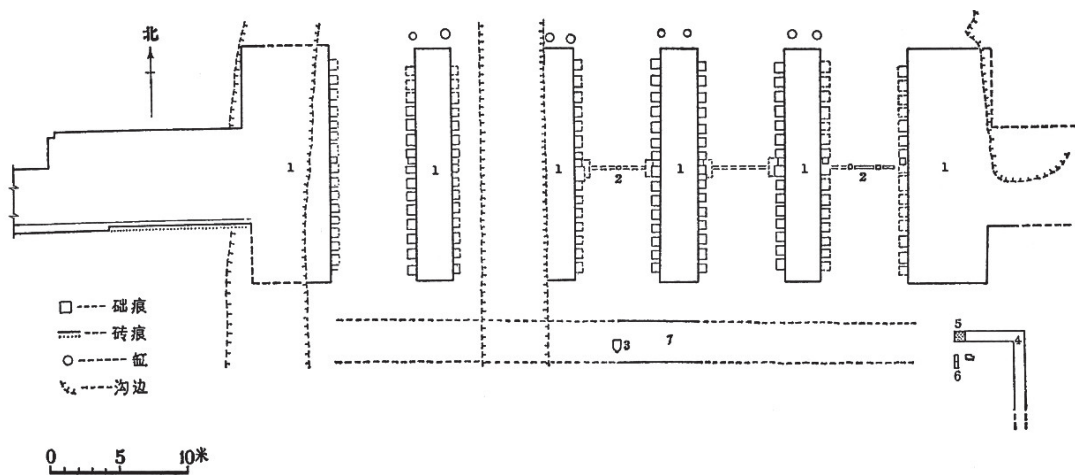
四、隋唐长安城城门门阙的使用问题

根据刘庆柱先生对关于古代门阙种类的划分^[3]，我们在此主要讨论的是唐长安城的都城城门之阙、宫城城门之阙问题。

首先，我们来讨论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1973年马得志先生领衔发掘

了明德门遗址，基本明确了五门道、城外城壕等情况，（图四）但可惜的是当时仅发掘了门址本体，未对东西两侧城墙进行清理。今年，西安唐城队为配合西安市明德门遗址文化广场的建设，在以前发掘的基础上，对明德门遗址门墩东侧的城墙进行了探查，发现城墙的南北缘都是平直的，可证不存在朵楼（或可概称“阙楼”^[4]。西侧由于现代街道而未能完全探查，但考虑到对称原则，西侧城墙应与东侧城墙相同）。而唐洛阳城外郭城南门定鼎门遗址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为三门道制，其墩台的东西两侧33米处的城墙上设有东、西朵楼，与正门的门楼相呼应。这种现象充分说明，隋唐都城西京城与陪都东京城的南门配置无论在等级规模、还是在附属建筑的设置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我们来讨论隋唐长安城太极宫和大明宫的阙楼问题。唐太极宫的名称尽管是由隋大兴宫改名而来，但其宫城形制基本沿用未大变。宫城的正南门在隋代初曰广阳门，后改名昭阳门、显阳门，至唐初武德元年（618年）先改称顺天门，后又在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名为承天门。承天门遗址在



图四 明德门遗址考古平面图
1. 夯土城门墩 2. 残石门槛 3. 石龟 4. 房址残墙 5. 柱础 6. 铺地砖 7. 唐代濠沟

1959~1962年期间曾被考古探查过，表明遗址位于现在西安市的莲湖公园内，东墩台已经破坏，西墩台残长7米余，三门道及隔墙尚有遗存，其中西门道、中门道及东门道分别宽6.2米、8.5米和6.4米，西隔墙厚6.8米，东隔墙厚6.5米。从探查结果来看，东西门道宽度基本相同，但中门道明显加宽，应为御道所在，如此也就基本排除了承天门为五门道的可能。

承天门是隋大兴宫唐太极宫的正南门，根据《大唐六典》卷七有关大明宫含元殿东西两阁的设置如承天门之制的有关述说，我们可以肯定承天门外设有东西双阙，另据《唐会要》卷三十大内条“显庆五年（660年）八月，……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在承天门两侧新设朝堂、肺石、登闻鼓。此外，《新唐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仪卫上”载：“承天门内则左右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门外则左右骁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可见门内、门外都设有东西廊道。

唐大明宫丹凤门尽管兴建年代较承天门要晚，但同为宫城正南门，且为五门道制，按理来说，在门外两侧也必须配置双阙，但宋代吕大防石刻大明宫图及考古结果都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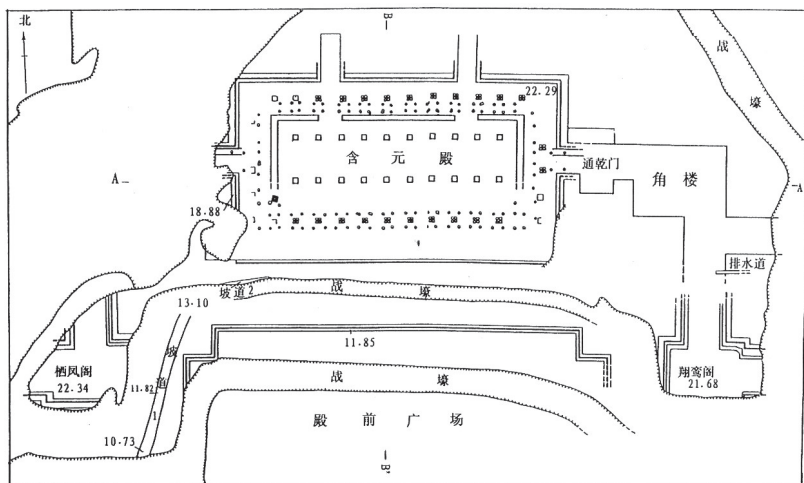
丹凤门东西两侧直连宫墙城垣，并未设置双阙或朵楼。

然而，南距丹凤门600余米的大明宫正殿含元殿，经过1957年及1995~1996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图五）揭示出三层夯土大台之上的殿堂东西两侧之南，分别建有高大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三出阙阙楼，两阙楼向北分别通过曲尺形廊道、角楼、侧门与殿堂相连接，从而形成了平面呈凹字形的殿、阙配置布局（刘庆柱先生称之为“A形阙”）。此外，在含元殿南的东西两侧，还发现有早晚两期的曲尺形朝堂建筑遗迹。另据文献记载，含元殿之南还仿承天门制那样设有肺石和登闻鼓，可惜发掘中未能找到，可能早已被移走或丢毁了。

大明宫丹凤门未设双阙^[5]，而在正殿含元殿补设双阙的现象，我们认为是有具体背景原因的。首先，大明宫始建于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是为高祖李渊而建的养老离宫。但不久随着李渊的驾崩，该宫的建设工程也就停止了。至高宗时，由于高宗身患风湿，加之武则天通过血腥的宫廷争斗取得皇后高位，致使恶梦不断等原因，促使高宗下决心扩建大明宫并在龙朔二年（662年）正式

搬入大明宫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后大明宫替代太极宫而成为唐朝的主要政治中心。大明宫扩建时设计者因地制宜，巧妙利用唐长安城北城墙的东段而豁开新建大明宫丹凤门，为此还把南面的两个里坊从中间劈开分成四个小的里坊，借此形成了宽阔的丹凤门大街。同

（下转42页）



图五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考古平面图

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 考古, 2000, (11). 参见第44页图四和图版陆. 据悉此城门应为宋代城门遗址。

[22] 同[6].

[23] 島田正郎. 祖州城: 东蒙古モンチヨックアゴラに存する——辽代古城址の考古学的历史学的发掘调查报告. 中泽印刷株式会社刊, 1955.

[24] a. 宋国栋. 辽代镇州城地理位置考辨.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7, (1).

b. 宋国栋. 蒙古国青陶勒盖古城研究. 内蒙古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c. 巴图. 蒙古国辽代城址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 辛革 刘亚玲)

(上接21页)

时, 在丹凤门的東西两侧430米、415米处的城墙(也是南宮墙)上, 还辟建了望仙门、建福门, 以便文武大臣进出宮城。上述历史背景说明, 丹凤门不设双阙是有主观和客观(利用外郭城北城墙)两方面原因的。

但是, 由于主要宮城的地位, 大明宮的设计者还是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方式, 选择在大明宮含元殿设置双阙, 以满足宮城礼制上的需要。含元殿以及东西阙楼的整体建筑虽然不是宮城之门, 但发挥了像承天门那样的宮城门阙的礼仪作用, 弥补了丹凤门未设双阙的缺憾。关于这一点, 著名的古建专家已经有所论述^[6]。

综上所述,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 隋唐长安城城门遗址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 使得城门形制特点、演变发展以及若干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澄清, 有效地推动了隋唐长安城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综合研究。

[1] a.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 1958, (3).

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长安大明宮.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c.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 考古, 1963, (11).

d.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 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74, (1).

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7, (5).

f.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陕西唐大明宮含耀门遗址发掘记. 考古, 1988, (11).

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宮丹凤门遗址的发掘. 考古, 2006, (7).

h.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宮兴安门遗址. 考古, 2014, (11).

[2] a.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 1958, (3).

b. 赵雨乐. 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

[3] 刘庆柱. 古代门阙制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氏著. 古都问道.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56~277.

[4] a. 明德门遗址的最新考古资料现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b. 杨鸿勋先生曾根据洛阳定鼎门遗址发掘结果, 认为明德门也应有类似的阙楼, 并画出了复原平面图。[唐长安明德门复原探讨. 文物, 1996, (4).]

[5] 杨鸿勋先生认为丹凤门也应有阙楼, 也画出了丹凤门阙楼复原平面图。(大明宮.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88~190, 图3-23.)

[6] 傅熹年. 唐长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状的探讨. 文物, 1973, (7).

(责任编辑: 方燕明)